

走读文化遗产



商
兽面纹铅质建筑构件

河南博物院藏



商
绿松石镶金饰件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藏



商
不雨卜骨

天津博物馆藏



新石器时代
陶鼓

东营市历史博物馆藏



商
陶鬲

安阳市文物普查队藏



一只陶鬲看夏商

商
『亚长』铜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商
兽面纹簋

山西博物院藏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海冰
实习生 张澜馨

配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重磅打造的《寻绎夏商》特展，眼下正在热展。

特展汇集全国35家文博单位的163件(套)精品文物。展品跨越多地、品类丰富，从一众明星文物到不太起眼的陶鬲，串联起夏商王朝四方交融的文明图景，为公众呈上一场文化盛宴。

四方瑰宝集体“出差”
讲述夏商文明故事

展览汇聚中国国家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等国内顶级文博机构的馆藏，涉及甘肃、河南、山西、四川、辽宁、内蒙古等多地。夏商精品文物集体来鄂“出差”，不少文物更是首次外借、限时展出。

河南博物院藏铅质建筑装饰部件，造型独特，纹饰精美，为商代王室专属的“高定”。商人大小事都会占卜，天津博物馆藏不雨卜骨，记录了商王对“是否不会下雨”的虔诚占卜，此次为卜骨首次出馆展出。三星堆遗址与石家河、盘龙城遗址有着密切关系，三星堆文物多次来湖北“走亲戚”。此次展出的三星堆博物馆藏青铜人面具，夸张的造型引人注目，观众们对其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更为着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亚长”觥，造型生动，近流处饰一大一小两头象纹，这种“大象带小象”的构图在商代青铜器中极为罕见。铭文中的这位亚长将军，是商王武丁时期战死沙场的铁血战将，地位仅次于赫赫有名的妇好。山西博物院藏兽面纹簋，器身满饰“三层花”纹饰——云雷纹衬底，凸起兽面主题，其上再施细纹，层次分明。最特别之处在于，簋的外底铸有一只似驴似马的神秘动物形象。专家推测，这是山西本地军事贵族“丙”族的族徽，实证这一族群与商王朝的紧密联系，是文明互动的珍贵物证。

“考古之最”集中登场
刷新夏商文明认知

展览汇集一批近年来创下考古纪录的“之最”级文物，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商代中期，从文字、建筑、青铜、礼乐等多个维度，刷新对夏商文明的固有认知。

其中，山东五村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陶鼓，是迄今所见较早的打击乐器，以泥质红陶烧制，搭配兽皮鼓面，底部预留出音孔，溯源中华礼乐文化的最初形态。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丁公陶文是一级文物，陶盆残片上留存5行11字，刻字笔画流畅，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成句文字。陕西芦山峁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筒瓦，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陶瓦实物之一，打破“陶瓦始于西周”的传统观点，重塑上古建筑发展脉络。

多项发现改写了夏商时期既往考古定论。其中，夏代晚期网格纹铜鼎，出土于河南二里头遗址，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有“华夏第一鼎”之称，是王权礼制萌生的象征，为探索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物证。同期亮相的二里头铜罍，是夏代稀少的青铜容器，是当时贵族专属器物。

一件迷你青铜鼎格外别致，器物高约5.1厘米、重约50克，出土于未成年人墓葬，为国内已知最小青铜鼎。它或许是古代孩童的玩具，也可能是为早夭孩童定做的丧葬明器，讲述3000多年前父母的拳拳爱子之心。

河南郑州商城书院街墓地出土的商代中期玉戈，是夏商王朝都城区域发现最大的一件玉戈，扉棱、穿孔，尽显高超的玉器制作水平。湖南湘乡出土的商代

晚期兽面纹铜爵，器形高大，是南方地区目前所见爵中最大的一件。

南土重镇盘龙城
见证南北深度交融

考古学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接受采访时表示：“盘龙城是首次从考古角度证实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摇篮的遗址，实证夏商时期中央与地方已形成成熟的互动格局。”

展览以实物为证，清晰展现盘龙城强大的辐射力，实证三千多年前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明互通互融的历史实景。

其中，盘龙城遗址李家嘴二号墓出土的青铜钺，是商代早期目前发现的出土体量最大的青铜钺，象征着区域最高军事统治权。盘龙城杨家湾17号墓出土的绿松石镶金饰件，是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绿松石镶金制品，经考古工作者复原后，完整呈现出一首双身的浮雕龙形态。铜带螭形器兼具觚、罍、角等青铜酒器的部分特征，左右对称，富有美感，被认为是本地特有的创新器型。盘龙城出土的大批高规格绿松石器、青铜礼器等，充分印证其作为商朝南土中心城邑的枢纽作用，是南北物资流转、技艺互通的核心节点。

依托稳固的军政地位，盘龙城形成广阔辐射圈，深刻影响着今湖北及周边区域发展。对比荆州与盘龙城出土青铜罍，不难发现，二者器型、款式高度相似，足以证明盘龙城商文化向南强力传播。

“夏商文明是当下考古研究的重点领域，盘龙城遗址是夏商文明考古谱系中的关键一环。此次全国性文博盛会落地盘龙城，既是对湖北文博、考古工作的充分认可，也为大众了解早期中国发展脉络搭建重要窗口。”张昌平说。

鄂东工匠北上殷墟
融入早期中国“移民城市”

展品中，有一件不太起眼的陶鬲，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北徐家桥墓地，形制却与商代鄂东地区的陶鬲近似。该墓地是石匠家族墓地，表明鄂东地区的匠人来到都城加入制石手工业生产中来。

“鄂东南工匠北上制器，生动再现夏商时期人口迁徙、技术互通，鲜活诠释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发展特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策展人宋若虹介绍，展览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揭开了夏商中心都邑作为中国早期“移民城市”的历史面纱——

夏商时期的中心都邑，并非封闭的王权中心，而是四方族群技术、人员汇聚交融之地。根据同位素分析，二里头作为当时东亚规模最大的都邑，可能有三成的外来人口。根据体质人类学和陶器类型学分析，晚商都城殷墟更是汇聚了八方人口。河南东南部、长江流域、晋陕高原、山东半岛、北方草原地带等族群在此聚居，成为上古中国族群融合的典范。

在南北文明交融中，来自长江流域的手工业匠人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不止鄂东地区风格的陶器，殷墟出土的印文硬陶、原始瓷等器物，也带有鲜明的长江流域手作风格。

夏商王朝的崛起，同样离不开四方资源与文化的深度整合。牙璋和陶鬲丰富了礼器的组合，小麦和绵羊充实了物产的结构，铜矿、锡矿、池盐等资源不断输入，龟甲保障了占卜活动的持续开展，马和马车改变了战争形态与交通方式……四方物产与技术专长，在王朝的统一调度下汇聚融合，共同支撑起夏商王朝的繁荣。

一件件跨越山海的文物，串联起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夏商形成的礼乐制度、都城轴中线格局、成熟文字体系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来自山西文博界的李先生感慨：“漫步展厅便能感受到，历史从未走远，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参与今天的构建。”

夏
网格纹铜鼎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藏



商
铜钺

湖北省博物馆藏

